

关于汉晋琅邪诸葛氏的“族姓”问题

——论诸葛亮与刘备的政治结合

方诗铭

三国时期蜀国建立是从诸葛亮与刘备的政治结合开始的。这里论述诸葛亮、刘备皆出自寒微，政治上彼此共通，说明他们的结合并非偶然。同时，着重探讨琅邪诸葛氏成为“族姓”，不始于东汉而始于东晋建国之初。

一

《元和姓纂》卷二“诸葛”条说：“诸葛氏，（岑仲勉《元和姓纂四校记》说：“《类稿》五六、《备要》三〇均引作‘本葛氏’，此误。”）夏殷侯国葛伯之后。《英贤传》云：‘旧居琅邪诸县，后徙阳都，先有詹葛，时人谓之诸葛氏，因氏焉。’（《四校记》说：“温校据《类稿》引文衍‘詹’字，余案《备要》亦无之。”）《风俗通》云：‘葛婴为陈涉将军，有功，非罪而诛，汉文追封子孙为诸县侯，因以为氏。’《世本》云：‘有熊氏之后为詹葛氏，齐人语讹，以詹葛为诸葛氏。’琅邪阳都县。汉司隶校尉诸葛丰裔孙圭，后汉太山郡丞，生瑾、亮。瑾，吴大将军、左都护、宛陵侯，生恪、乔；恪中书令、扬州牧；乔生攀，翊武将军，生颢，徙河东。亮，蜀丞相、武乡侯，生瞻，蜀尚书仆射；瞻生京，晋江州刺史，与颢并徙河东。亮族弟诞，魏司空、兖州刺史，生靚，奔吴为大司马；靚生恢，东晋左仆射、尚书令，生彪。”^① 这是关于诸葛氏的较为详细的叙述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七〇引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说：“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，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以忠强立名，子孙代居二千石。三国之兴，蜀有丞相亮，吴有大将军瑾，魏有司空诞，名并盖海内，为天下盛族。”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正史类“《晋中兴书》七十八卷。起东晋，宋湘东太守何法盛撰”。《晋中兴书》是刘宋时的著作，在《元和姓纂》之前，其中有一点未被《姓纂》采录，即诸葛丰之后“子孙代居二千石”。为什么对《晋中兴书》所述《姓纂》却加以删除？即是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。

《汉书·诸葛丰传》说：“诸葛丰字少季，琅邪人也，以明经为郡文学，名特立刚直。贡禹为御史大夫，除丰为属，举侍御史。元帝擢为司隶校尉，刺举无所避，京师为之语曰：‘间何阔，逢诸葛。’”诸葛亮、诸葛瑾、诸葛诞都是诸葛丰之后，现以诸葛亮为主首先从事考察。

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说：“诸葛亮字孔明，琅邪阳都人也。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。父珪，字君贡，汉末为太山郡丞。亮早孤，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，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。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。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，往依之。”裴松之注引《献帝春秋》说：“初，豫章太守周术病卒，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，治南昌。汉朝闻周术死，遣朱皓代玄。皓从扬州刺史刘繇求兵击玄，玄退屯西城，皓入南昌。建安二年正月，西城民反，杀玄，送首诣繇。”据此，诸葛亮的家世可上溯到诸葛丰，当即为《元和姓纂》所从出，但是，从诸葛丰到诸葛亮之父诸葛珪，凡二百余年，其间迄无一人见于记载，因而诸葛亮的家世是否真的出于诸葛丰应该是一个疑问。东汉末年，诸葛珪所任仅为太山郡丞，不过是六百石的小官；^② 诸葛玄得为豫章太守也是在战乱时代为袁术或刘表所任命，他们都不是当时

^① 《元和姓纂》，金陵书局本；《元和姓纂四校记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本。

^② 汉书·百官公卿表说：“郡守……有丞，边郡又有长史，掌兵马，秩皆六百石。”

的显赫人物。至于前引《晋中兴书》诸葛丰“子孙代居二千石”也应该是一个疑问，据《汉书》，除诸葛丰外没有第二个姓“诸葛”的人；《后汉书》所载，在诸葛亮之外，《刘盆子传》中还有一个诸葛穉，他是赤眉军中的“卫尉”，当然不是汉朝的“二千石”。这是来自东晋《诸葛氏谱》对其“族姓”的虚美，为《晋中兴书》所据，《元和姓纂》不加采录是正确的。对《诸葛氏谱》，将在后面讨论。

关于诸葛瑾、诸葛诞二人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诸葛瑾传》说：“诸葛瑾字子瑜，琅邪阳都人也。汉末避乱江东。”所谓“避乱”，按照同《传》诸葛瑾所自述：“遭本州岛倾覆，生类殄尽，弃坟墓，携老弱，披草莱，归圣化。”据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，琅邪国属于徐州刺史部，所谓“本州岛倾覆，生类殄尽”，应该是指曹操与陶谦多次争夺徐州的战争，诸葛瑾从而“弃坟墓，携老弱”，自琅邪“避乱”来到江东。同书《魏志》的《诸葛诞传》说：“诸葛诞字公休，琅邪阳都人，诸葛丰后也。初以尚书郎为颖阳令，入为吏部郎。”诸葛瑾是诸葛亮之兄，来到江东是为了“避乱”。诸葛亮随同诸葛玄来到荆州，据《诸葛亮传》所收陈寿《上诸葛亮集表》，同样是为了“避难”，刘表统治下荆州是当时较为安定的地区，《出师表》所谓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即说明了这一点。诸葛诞是诸葛亮的从弟，从琅邪辗转来到中原，出仕于魏，应该也是为了“避难”。^①

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说：“诸葛瑾、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，各在一国。于时以为蜀得其龙，吴得其虎，魏得其狗。”尽管三人都称为诸葛丰之后，但如前所说，从西汉元帝时任司隶校尉的诸葛丰，到东汉末年已过为遥远，是否真实也在疑似之间，而且从诸葛丰到诸葛亮兄弟，其间凡二百余年，史籍上也并无一名显赫的诸葛氏人物出现。说明琅邪诸葛氏不属于世代衣冠、宗族繁盛的“世族”、“强族”或“大姓”，即所谓“族姓”，而是属于“单微”、“单寒”或“单家”，诸葛亮在荆州的好友之一徐庶即是一名“单家子”。^②诸葛亮、诸葛瑾、诸葛诞三人“并有盛名”，首先是由于他们各自的卓越才能，其次则是他们正好赶上东汉末年这个战乱时代的机缘。

二

人们在这里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东晋之初琅邪诸葛氏是著名“族姓”，也有《诸葛氏谱》的谱牒，除前引诸葛氏“为天下盛族”外，汤球辑本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卷七还有“琅邪诸葛录”，^③与“琅邪王录”、“吴郡雇录”等并列。对这个问题，这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。

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说：“诸葛令（诸葛恢）、王丞相（王导）各争‘姓族’先后，王曰：‘何不言葛、王，而云王、葛？’令曰：‘譬言驴马，不言马驴，驴宁胜马邪？’”此事亦见《晋书·诸葛恢传》：“值天下大乱，（诸葛恢）避地江左，名亚王导、庾亮。”“导尝与恢戏争‘族姓’，曰：‘人言王、葛，不言葛、王也。’恢曰：‘不言马驴，而言驴马，岂驴胜马邪？’其见亲狎如此。”《世说》所云“姓族”当据《晋书》作“族姓”。

“族姓”一词东汉屡见。《后汉书·张堪传》说：“张堪字君游，南阳宛人也，为郡‘族姓’。堪早孤，让先父馀财数百万与兄子。”“世祖微时，见堪志操，常嘉焉。及即位，中郎将来歙荐堪”，“在道追拜蜀郡太守”，“拜渔阳太守”。“论曰：张堪、廉范皆以气侠立名，观其振危急，赴险厄，有足壮者。堪之临财，范之忘施，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。”同书《冯鲂

^① 余嘉锡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（《方正》）说：“（琅邪王司马佃）三子繇字思玄。《诸葛亮传》称‘亮从父玄’，本书《品藻篇》称‘（诸葛）诞为瑾、亮之从弟’，则诞盖玄之子。思玄者，欲令思其外曾祖也。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）疑是。

^② 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魏略》。

^③ 《九家旧晋书辑本》，《丛书集成》本。

传》说：“冯鲂字孝孙，南阳湖阳人也。”“为郡‘族姓’。王莽末，四方溃叛，鲂乃聚宾客，招豪杰，作营壘，以待所归。”“（建武）十三年，迁魏郡太守。二十七年，以高第入代赵熹为太仆。中元元年，从东封岱宗，行卫尉事。还，代张纯为司空，赐爵关内侯。”“子柱嗣，尚显宗女获嘉长公主。”“位至将作大将。柱卒，子定嗣，官至羽林中郎将。”“定弟石，袭母公主封获嘉侯，亦为侍中，稍迁卫尉。”“迁光禄勋，遂代杨震为太尉。”其后仕宦累代不绝。同书《独行陆续传》说：“陆续字智初，会稽吴人也。世为‘族姓’。祖父闾，字子春，建武中为尚书令。”尽管陆续仅“仕郡户曹史”，但“长子稠，广陵太守”，“中子逢，乐安太守”，“少子褒，力行好学，不慕虚名，连征不就，褒子康，已见前传。”《陆康传》说：“陆康字季宁，吴郡吴人也。祖父续，在《独行传》。父褒有志操，连征不至”，“光和元年，（陆康）迁武陵太守，转守桂阳、乐安二郡，所在称之”，“拜康庐江太守”。“少子绩，仕吴为郁林太守，博学善政，见称当时。”其时陆姓与朱、张、雇三姓并称，是吴郡著名的“四姓”之一。

从上面所征引看来，所谓“族姓”应该包括下列内涵。第一，家富于财，张堪曾“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”即是一例。第二，张堪“振穷急，赴险厄”，“以气侠立名”；冯鲂“聚宾客，招豪杰，作营壘”，说明“族姓”不但族大人众，当“四方溃败”之际，还可以招聚“宾客”、“豪杰”，建立“营壘”，保护自己，也保护他人，张堪“以气侠之名”也是如此。更为重要的是第三，属于“族姓”的张堪、冯鲂、陆续，父祖子孙都曾出任为太守，有的还位至司空、太尉等三公高位，而且绵延不绝，贯通东汉一代。仲长统《昌言》说：“选士而论族姓、阀阅”，^①更说明“族姓”、“阀阅”是同义词。所谓“阀阅”世所习知，此不具论。

综上所述，东汉末年的琅邪诸葛氏完全不具备“族姓”的条件，尽管后来诸葛亮、诸葛瑾、诸葛诞分别在蜀、吴、魏三国身居高位，按照当时条件也不属于“族姓”。至于诸葛恢，则是在东晋之初的特殊情况下才成为“族姓”的。

《晋书·诸葛恢传》说：“诸葛恢字道明，琅邪阳都人也。祖诞，魏司空，为文帝（司马昭）所诛。父靚，奔吴，为大司马。吴平，逃窜不出。武帝与靚有旧，靚姊又为琅邪王妃，帝知靚在姊间，因就见焉。”“恢弱冠知名”，“值天下大乱，避地江左，名亚王导、庾亮”。“元帝为安东将军，以恢为主簿，再拜江宁令。讨周馥有功，封博陵亭侯，复为镇东参军。”“承制调为会稽太守。”“明帝征（王）敦，以恢为侍中，加奉车都尉。讨王含有功，进封建安伯。”“又拜恢后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征为侍中，迁左民尚书、武陵王师、吏部尚书。累迁尚书右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、银青光禄大夫、领选本州岛大中正、尚书令，常侍、吏部如故。成帝践祚，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年六十二。赠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赙赠之礼，一依太尉兴平伯（陆完）故事。”这里摘录诸葛恢的仕履，目的是说明为什么东晋之初诸葛恢得到如此显赫的地位，并成为“族姓”。曹魏时期诸葛诞与司马懿属于姻亲，所谓“（诸葛）靚姊为琅邪王妃”，即司马懿子后封琅邪王司马奭之妃。《晋书·宣五王传》说：“齐王（司马）冏辅政，（司马）澹母诸葛太妃表澹不孝，乞还（司马）繇，由是澹与妻子徙辽东。”武陵王司马澹、东安王司马繇都是琅邪王司马奭之子。同《传》又说：“东夷校尉文倝父钦为（司马）繇外祖诸葛诞所杀，繇虑倝为舅家之患，是日亦以非罪诛倝。”《三国志·魏志·诸葛诞传》注引《晋诸公赞》也说：“东安公（司马）繇，诸葛诞外孙，欲杀倝，因诛杨骏，诬倝谋逆，遂夷三族。”据《晋书·刑法志》，司马师辅政时改变魏法，“既醮之妇，徒夫家之罚”，说明后来诸葛诞尽管为司马昭所诛，诸葛氏与司马氏之间的姻亲关系并未破裂，直到西晋惠帝时，诸葛诞的外孙司马繇仍为“舅家”除患，借诛杨骏之机杀诸葛氏的仇家文倝。同时，诸葛诞一系与司马氏不但为姻亲，而且诸葛靚与晋武帝“有旧”，可能是年轻时的好友，因而更加保证了诸葛诞一系的诸葛氏在晋朝的发展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如上引《诸葛恢传》所说，“值天下大乱，（诸葛恢）避乱江左，名亚王导、庾亮”，终于成为与琅邪王氏并列的“族姓”，这显然与晋元帝渡江称帝有关。《晋书·宣武王传》说：“（琅邪王司马奭）子恭王

^① 严可均《全后汉文》，卷89。

覲立。”“太熙元年薨，时年三十五。子睿立，是为元帝。”恭王司马覲与诸葛太妃所出的武陵王司马澹、东安王司马繇为兄弟行，诸葛恢与晋元帝为舅甥关系，非同一般，而且元帝为安东将军尚未称帝时，诸葛恢即任主簿，倚之如左右手，“名亚王导、庾亮”，完全不是偶然的。

综上所述，琅邪阳都的诸葛氏成为“族姓”，发源于魏的诸葛诞一系，与蜀的诸葛亮和吴的诸葛瑾无关。东晋之初，诸葛诞之孙诸葛恢为晋元帝之舅，且有佐命之勋，与琅邪王氏的王导合称“王、葛”，琅邪诸葛氏始成为当时的“族姓”。

至于《诸葛氏谱》，今仅存佚文二条，见于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和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引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诸葛氏谱》说：“（诸葛）京字行宗。”诸葛京是诸葛瞻之子，诸葛亮之孙。同《传》注引《晋泰始起居注》说：“诏曰：‘其（诸葛亮）孙京，随才署吏。’后为郿令。”又说：“尚书仆射山涛《启事》曰：‘郿令诸葛京，祖父亮，遇汉乱分隔，父子在蜀，虽不达天命，要为尽心所事。京治郿自复有称，臣以为宜以补东宫舍人，以明事人之理，副梁益之论。’京位至江州刺史。”同书《霍峻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也说：“（罗宪）从帝（晋武帝）宴于华林园，诏问蜀大臣子弟，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。”罗宪所荐举的人中亦有琅邪诸葛京，“即皆叙用，咸显于世”。说明晋武帝笼络蜀大臣子弟，但诸葛京虽被“叙用”，仍不过位至江州刺史，其后亦无闻。《世说新语·方正》注引《诸葛氏谱》说：“（诸葛）恢子衡字峻文，仕至荥阳太守，娶河南邓攸女。”据《方正》本条，诸葛恢长女适太尉庾亮长子庾会，后改适江；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之子羊楷。“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，恢乃云：‘羊、邓是世婚，江家我顾伊，庾家伊顾我，不能复与谢衰儿婚。’及恢亡，遂婚。”说明与诸葛恢结为姻亲的有陈国阳夏谢氏、泰山南城羊氏、颍川陵庾氏、陈留圉县江氏，都是当时的著名“族姓”。因而《诸葛氏谱》与《世说新语》注引《谢氏谱》、《羊氏谱》、《庾氏谱》等相同，皆为宣扬其“族姓”而编撰。尽管《诸葛氏谱》现仅佚文二条，但其中一条值得注意，即“（诸葛）京字行宗”条，可以看出，这部谱牒不但仅是诸葛诞，还包括诸葛亮一系，当然还有诸葛瑾一系。

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说：“（诸葛）乔字伯松，亮兄瑾之第二子也，本字仲慎，与兄元逊（诸葛恪）俱有名于时。”“初，亮未有子，求乔为嗣，瑾启孙权遣乔来西，亮以乔为己适子，故易其字焉。”“（诸葛乔）年二十五，建兴六年卒。子攀，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，亦早卒。诸葛恪见诛于吴，子孙皆尽，而亮自有胄裔，故攀还复为瑾后。”“（诸葛瞻）次子京及攀子显等，（魏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。”东汉末年的琅邪诸葛氏不属于“族姓”，到了三国时期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蜀亡身死；诸葛瑾之子诸葛恪“见诛于吴，子孙皆尽”，赴蜀之子诸葛乔、乔子攀亦早卒；在魏的诸葛诞以起兵反对司马氏被杀，“夷三族”，仅“小子覲至吴请救”获免。^①即下迄诸葛京、诸葛显于蜀亡后被“内移河东”，其间亦不及五十年，而且诸葛亮等三人又分处三国，按照当时标准来说，同样不得属于“族姓”。

由于与东晋皇室为至亲，加以“值天下大乱避地江左”之际，诸葛诞一系的诸葛恢因而得以预于“族姓”之列。为宣扬其“族姓”计，诸葛恢必然借诸葛亮、诸葛瑾以自重，尤其是前者，对诸葛氏先世的宣扬则更是必然的，如前引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所说诸葛丰“子孙代居二千石”，“为天下盛族”。十分明显，《诸葛氏谱》出于诸葛恢家族之手，目的在于确定琅邪诸葛氏早已属于“族姓”，《晋中兴书》所据也当来自《诸葛氏谱》的虚美。

近人周明泰撰《三国世系表》，^②关于诸葛氏，从西汉元帝时的诸葛丰开始，其下即接以东汉末年的诸葛珪，与前引《诸葛亮传》、《诸葛诞传》同。王伊同所撰《五朝门第》，^③勾索典籍，用力甚勤，该书所收《五朝高门世系婚姻表》三三为“琅邪阳都诸葛氏”，据《元

^① 《三国志·魏志·诸葛诞传》。

^② 《二十五史补编》本。

^③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7年本。

和姓纂》等书详述，除得姓之始外，亦仍从诸葛丰开始，其下为诸葛珪，再下为诸葛瑾、诸葛亮、诸葛诞，其后最为显赫的还是诸葛诞一系。如果说，诸葛氏属于“族姓”，那么，其开始者祇能是诸葛诞一系的诸葛恢，诸葛瑾、诸葛亮都不能预于“族姓”之列。

三

作为不属于当时“族姓”的诸葛亮，在荆州是不可能得到刘表重视的。首先，据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，刘表是鲁恭王之后，在“党锢之祸”中，又“与同郡（山阳高平）张俭等俱被讪议，号为‘八顾’。诏书案捕党人，表亡走得免。党禁解，辟大将军何进掾”。刘表是当时的“名士”。其次，在荆州，刘表所倚重的是南郡的蒯越、襄阳的蔡瑁，他们都是荆州“士族”的代表人物。尽管刘表是列于“八顾”的“名士”，但是据《三国志·蜀志·刘表传》、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看来，刘表又绝不是一个才智出众的人物。对此，这里没有必要多作征引，祇需看陈寿、范曄对他所作的评论即可知道。陈寿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表传》的评论是：“（刘表）外宽内忌，好谋无决，有才而不能用，闻善而不能纳。”范曄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的评论也是：“刘表道不相越，而欲卧收天运，拟纵三分，其犹木偶之于人也。”诸葛亮在荆州应该熟知刘表的为人，对这个“有才而不能用”的“木偶”，当然是不会入眼的。

“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所作的这个自述，真的显示他“躬耕南阳”时的心态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，如同诸葛瑾“避乱”江东，在东汉末年这个战乱时代，这是人们的共同心态。诸葛亮到荆州同样是为了“避难”，前已论及，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所谓“不求闻达于诸侯”。在南阳，诸葛亮与博陵崔州平，颍川徐庶、石韬，汝南孟建，建立颇为亲密的友谊。与诸葛亮相同，他们也分别从博陵、颍川、汝南前来荆州，也应该是为了“避难”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说：“（诸葛亮）身長八尺，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，时人莫之许也。”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说：“（诸葛）亮在荆州，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、徐元直，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，三人务于精熟，而亮观其大略。每晨夜从容，常抱膝长啸，而谓三人曰：‘卿三人仕进，可至刺史、郡守也。’三人问其所至，亮但笑而不言。”诸葛亮为什么以管仲、乐毅自比？《论语·宪问》说：“管仲相（齐）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”这是孔子对管仲的赞扬。至于乐毅，他为燕昭王的上将军，率军伐齐，下齐七十馀城，见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。诸葛亮以名相管仲、名将乐毅自比，这种抱负当然不是“不求闻达于诸侯”，他心目中的“诸侯”是求贤若渴的齐桓公、燕昭王。石广元即石韬，徐元直即徐庶，孟公威即孟建，“卿三人仕进，可至郡守、刺史”，及“三人问其所至”，所谓“笑而不言”，意在言外，说明诸葛亮没有将刺史、郡守放在眼里，所期许的当然是如管仲、乐毅那样的名将相。“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”，这才是诸葛亮当时的真正心态。“不求闻达于诸侯”，这里所谓“诸侯”，应该指割据荆州的刘表。前引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曄评论刘表是“其犹木偶之于人也”，在这位“木偶”统治的荆州，诸葛亮是不可能“闻达”的，他所看中的是荆州这块“用武之国”（见《隆中对》），所期望的则是另一个“诸侯”，而不是刘表。所谓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，正是为了今后的“闻达于诸侯”，这才是诸葛亮当时的心态。

在荆州，诸葛亮眼里没有刘表这个“木偶”，至于刘表眼里是否有这个“躬耕于南阳”的诸葛亮呢？尽管史籍上没有留下记载，但是从一个侧面，却可以为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答案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刘孝标注引《司马徽别传》说：“（司马）徽字德操，颍川阳翟人，有人伦鉴识，居荆州。知刘表性暗，必害善人，乃括囊不谈议时人。”“人谓刘表曰：‘司马德操，奇士也，但未遇耳。’表后见之，曰：‘世间人为妄语，此直小书生耳。’”据《三国志·蜀志·庞统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襄阳记》，司马徽当时被称为“水镜”，即是说，他如水如镜，以

鉴识人伦着称。在荆州负有重望的司马徽，当人们向刘表推荐时，刘表也曾会见。结果却是对这位“未遇”的“奇士”，刘表看来不过是一名“小书生”，人们对他称誉也属于“世间人”的“妄语”。这正如前引陈寿在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表传》对刘表所作的评论：“有才而不能用于，闻善而不能纳。”与司马徽被称为“水镜”的同时，诸葛亮也被称为“卧龙”，当时他们是齐名的。刘表轻视“水镜”为“小书生”，即使人们曾向刘表推荐过诸葛亮，这位“卧龙”也当然会遭到轻视。这个侧面说明，刘表眼里是不可能有什么诸葛亮这类人物的。

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襄阳记》说：“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（司马徽），德操曰：‘儒生俗士，岂识时务？识时务者在乎俊杰，此间自有伏龙、凤雏。’备问为谁，曰：‘诸葛孔明（诸葛亮）、庞士元（庞统）也。’”作为“伏龙”的诸葛亮，在司马徽眼里不是“儒生俗士”，而是“识时务”的“俊杰”，这是很高也是符合实际的评价，诸葛亮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。在荆州，刘备开始出现在诸葛亮的视野中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说：“时先主（刘备）屯新野。徐庶见先主，先主器之，谓先主曰：‘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，将军岂愿见之乎？’先主曰：‘君与俱来。’庶曰：‘此人可就见，不可屈致也。将军宜枉驾顾之。’由是先主遂诣亮，凡三往，乃见。”徐庶是诸葛亮的好友，他在刘备那里得到重视。诸葛亮、刘备会见的结果，产生了《隆中对》。

刘备是当时惯于反噬的“枭雄”，拙著《“枭雄”刘备的起家与“争盟淮隅”》已有所论述，^①请参看，这里不拟详说。当诸葛亮与刘备相见之时，刘备正寄居荆州，目的是伺机夺取刘表的这块地盘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说：“荆州豪杰归先主（刘备）者日益多，（刘）表疑其心，阴御之。”裴松之注引《世语》说：“（刘）备屯樊城，刘表礼焉，惮其为人，不甚信用。”所谓“表疑其心”，“惮其为人”，说明刘表不但对刘备深为疑忌，而且暗中加以防备。对刘备的“枭雄”行径，刘表有所知晓，诸葛亮当然也有所知晓，为什么刘备却成为诸葛亮心目中的“诸侯”呢？

“权变之时，固非一道所能定也，兼弱攻昧，五伯之事。”^②(11)这是庞统成为刘备谋士后对刘备所说的。据上引《襄阳记》，庞统是司马徽称誉的“凤雏”，与“伏龙”并列的通晓“时务”的“俊杰”。当处于“权变之时”，“非一道所能定”，不能像“儒生俗士”那样墨守成规。《隆中对》中，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也正是“兼弱攻昧”之策，即“兼”刘表之“弱”，“攻”刘焉之“昧”；所谓“五伯之事”，与《隆中对》中的“霸业可成”更完全是一回事，诸葛亮以辅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自许也可以说明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引《诸葛亮集》所载刘备遗诏说：“闻丞相（诸葛亮）为写《申》（申不害）、《韩》（韩非）、《管子》（管仲）、《六韬》一通已毕，未送道亡，可自更求闻达。”世所习知，诸葛亮的思想以法家为主，与庞统的思想属于同一类型。

作为“枭雄”的刘备，尽管满口“宽”“仁”“智”“信”，但反复无常，庞统所说的“权变之时，固非一道所能定也”，从刘备以往的行径看即是如此。如前所说，当时刘备也正在“兼弱攻昧”，所“兼”的对象是荆州的刘表。前引刘备遗诏，他和诸葛亮一样，赞同后主读《申》、《韩》、《管子》之书。因而诸葛亮所选择的正是这样的“诸侯”，决非像刘表那样是“卧收天运”的“木偶”。

四

对刘备与诸葛亮的政治结合，当然不能仅从诸葛亮方面考察，还应该从刘备方面加以探讨。

^①《史林》1994年第2期。

^②《三国志·蜀志·庞统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。

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说：“先主姓刘，讳备，字玄德，涿郡涿县人，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。胜子贞，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，坐酎金失侯，因家焉。”中山靖王子刘贞史籍上确有其人，但所封是“陆城侯”，^①而不是“陆城亭侯”。《三国志集解》引潘眉说“前汉无乡亭之封”，所谓“亭侯”是东汉制度。同时，从西汉景帝到东汉末年，其间已历数百年，即使属实，刘备与汉家皇室的关系也已极为疏远，早已说不上是“宗室”了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曹彰传》注引《魏略》说：“太祖（曹操）在汉中，而刘备栖于山头，使刘封下挑战。太祖骂曰：‘卖履舍儿，长使假子拒汝公乎！’”尽管刘备之祖刘雄、父刘弘曾“世仕州郡”，刘雄并举孝廉，官至东郡范令。但由于“少孤”，“与母贩履织席为业”，^②从而被曹操轻视为“卖履舍儿”。“帝室之胄”是遥远难稽的，“卖履舍儿”却是现实的，刘备是当时的一个小人物。

《先主传》又说：“（刘备）好交结豪侠，年少争附之。中山大商张世平、苏双等资累千金，贩马周旋于涿郡，见而异之，乃多与之金财，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。”所谓“豪侠”、“年少”，一般说来虽非贬义词，但是，“豪侠”中的“轻侠”则是为人们所不齿的，属于游侠中的最低层。《后汉书·王涣传》说：“（王）涣少好侠，尚气力，数通剽轻少年。”李贤注：“剽，劫夺也。”《三国志·吴志·甘宁传》说：“（甘宁）少有力，好游侠，招合轻薄少年，为之渠帅”，“至二十余年，止不攻劫”。裴松之注引《吴书》说：“（甘）宁轻侠杀人，藏舍亡命，闻于郡中。”刘备好结交“豪侠”，并为“年少”所争附，他本人当然也是一名游侠之士，至于是否属于“轻侠”，这里有必要首先加以探讨。《先主传》引《典略》说：“平原刘子平知（刘）备有武勇。”所谓“武勇”，即上引《王涣传》的“尚气力”、《甘宁传》的“少有力”；同书《关羽传》说：“（关羽）亡命来涿郡，先主（刘备）于乡里合徒众，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。”所谓关羽“亡命”来涿郡，当然是投奔刘备，如上引《吴书》所说的“（甘宁）藏舍亡命”，刘备同样如此。从而可以推知，争附刘备的“年少”（“少年”），亦即上引《王涣传》的“剽轻少年”、《甘宁传》的“轻薄少年”，说明早年在故乡涿郡刘备应该是一名为人们所不齿的“轻侠”，与王涣、甘宁相同。关于“轻侠”，请参看拙著《剑客·轻侠·壮士——吕布与并州军事集团》一文，^③这里不再多加述说。

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说：“时黄巾复来侵暴，（孔）融乃出屯都昌，为贼管亥所围。融逼急，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。备惊曰：‘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！’”《三国志·魏志·吕布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说：“（吕）布初入徐州，书与袁术。术报书曰：‘术生年已来，不闻天下有刘备。’”对孔融的求救，刘备受宠若惊，感到孔融还知道天下有刘备；出身于四世三公家族的袁术则公开说，自己从来未曾听说过天下有刘备。说明当时刘备虽已任平原相或被推为徐州牧，但在孔融、袁术这类大人物的眼里，仍旧是一名不足挂齿的小人物，甚至刘备本人的自我感觉也是如此。

当刘备在家乡“合徒众”之后，先后依附过公孙瓒、陶谦、吕布、曹操、袁绍。如上所说，他“三顾茅庐”，与诸葛亮结识，正是从袁绍那里来到荆州投靠刘表之际。鉴于以往一再失败的教训，刘备应该深切感到，从“轻侠”到“枭雄”，在自己身边仅有关羽、张飞这类“熊虎之将”，所缺少的是运筹帷幄的谋士，而当时士族的代表人物如颍川荀氏的荀彧、荀攸，他们所选择的只能是曹操，决不能是刘备这样的小人物，刘备当然明白这一点。尽管罗致运筹帷幄之士已迫切提上日程，但刘备在荆州仍仅能“访世事”于被刘表轻视为“小书生”的司马徽，所器重的也仅是属于“单家子”的徐庶，非“族姓”而“躬耕于南阳”的诸葛亮正好符合于刘备的要求。

由于司马徽、徐庶推荐，刘备与诸葛亮二人开始了他们政治上的结合，除上述原因外，

^① 《汉书·王子侯表》。

^② 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。

^③ 《史林》1988年第1期。

最为重要的还是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，特别是他所提出的“此用武之国《荆州》，而其主（刘表）不能守，将军岂有意乎”，与刘备当前蓄意夺取荆州的策划不谋而合，刘备当然十分高兴，所谓“孤之有孔明（诸葛亮），犹鱼之有水也”，^①完全反映了刘备这时的心情。关于《隆中对》，请参看拙著《〈隆中对〉“跨有荆益”的策划为何破灭》一文，^②这里不再详论。

当然，作为“卖履舍儿”，而称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的刘备，与“躬耕南阳”的“布衣”，而称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为远祖的诸葛亮，彼此都处于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地位。因而，刘备所能选择的祇是诸葛亮这类人物，而诸葛亮也祇能选择刘备这样的“诸侯”，仅就这一点而论，说明他们在政治上的结合也不是偶然的。

（原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58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）

^① 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。

^② 《学术月刊》1997年第2期。